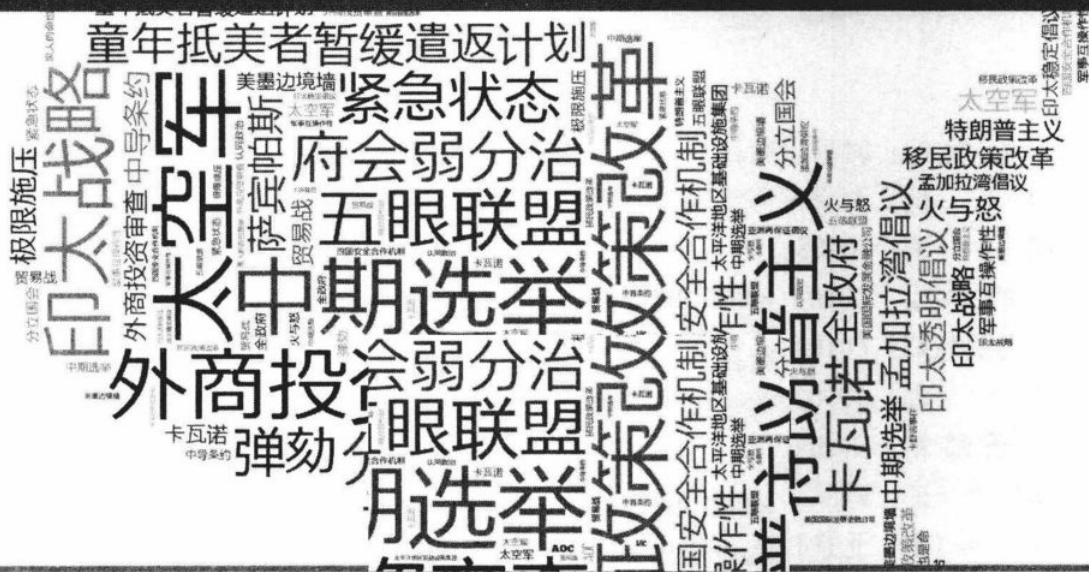




# 美国大势

## MAPPING THE USA

[ 2018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大势. 201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7-5195-0340-6

I. ①美… II. ①中…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6109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00 千字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作者简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是我国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之一，以战略性、动向性、对策性、涉我性为主要研究特色。研究所下设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军事与安全、美国外交四个研究室以及中美关系研究项目。现有研究人员20余人，其中半数以上为高级职称研究人员。研究所拥有国内外各类报刊、杂志和基础资料百余种，与美国多家智库、大学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感谢关注时事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官方网站



时事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 力

封面设计：杨 洋

# 目 录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评估与前瞻····· 王鸿刚 1

## 第一编 美国政治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新国会及其影响····· 张文宗 17

浅析特朗普第一任期移民政策改革····· 李默 34

## 第二编 美国经济

特朗普能源政策及中美能源合作前景····· 余翔 53

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改革及影响····· 孙立鹏 79

特朗普贸易政策评析····· 马雪 92

## 第三编 美国外交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走向····· 陈文鑫 109

“特朗普主义”探析····· 杨文静 122

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

影响····· 董春岭 138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欧关系：大西洋更

宽了吗？····· 孙成昊 154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 王锦 172

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初探····· 宋清润 189

#### 第四编 美国安全

- 特朗普的安全观与安全战略调整…………… 李 岩 211
- 中美科技竞争：态势、趋势与影响…………… 李 峥 226
-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逻辑与困境…………… 贾春阳 244
- 特朗普政府太空政策评析…………… 张 磊 266

#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评估与前瞻

王鸿刚\*

2018 年中美之间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以及与此相伴的各种颇不寻常的复杂互动，使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再度成为世人最大的追问。过去几十年中，中美关系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如今，人们却不免心生疑惑：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遭遇各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强大抵制，中美合作的国际环境是否已经难以维系？国际舆论有关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社会领域日益“脱钩”的担忧，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正在松动？美国府会、两党、政商各界充满敌意甚至有失理智的对华表态，以及中国方面极力克制却也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对美回应，是否意味着两国战略选择的重大改变？所有这些疑惑，正日益削弱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未来的信心。可以说，中美关系前途的极不确定，以及对中美关系的信心急剧下降，已成为影响两国自身发展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巨大阴云。因此，回顾中美关系如何一路走来，判定中美关系当前的性质特征及转变方向，对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战略环境并调整中国对美战略和整个对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中美关系的百年历史演进

随着工业革命日益从欧洲向全球铺展，大量主权国家相继诞生，世界经济形态、世界政治形态和各国国家形态日新月异，形成世界现代化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世界现代化进程，作为过去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流事件，构成我们分析大国关系的宏观背景。无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还是当今备受瞩目的中美关系，都可置于世界现

---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代化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其中强大和一贯的内在规律性。尤其是，要拨开当今中美关系的迷雾、预判其未来走向，更需跳出感性杂多的一时一事，将镜头拉得更远些，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透镜中加以长线 and 全面地考察，才能缕清其发展演进的脉络和方向。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前一后地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两个世界级大国。这种巨大的政治性、经济性和方位性的国家属性差异，是我们分析中美关系的逻辑基础。这种差异始终贯穿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并时而成为两国相互靠近与合作的动力，时而又成为彼此疏远和冲突的因缘。其到底发挥什么作用，乃是由现代国际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和中美两国在特定阶段的国家转型需求决定的。由世界化大生产和相应的国际政治安排组成的现代国际秩序，总是在“失衡—危机—纠偏—平衡”的周期循环中不断扩展升级，这种发展演进对中美两国和中美关系而言是只能顺应、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同时，中美两国为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总是针对不断变换的内外形势，有针对性地谋求国家形态和国家战略的转型调整，使中美关系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呈现出不同面貌。由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使各国紧紧连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则构成了中美关系中难以回避的“第三方因素”。其他各国的行动以及彼此分化组合，难免对中美两国和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美关系中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容忽视，它们从一个时期延宕至另一个时期，有时成为两国关系稳步向前的支柱，有时因得到有效管理而淡出视线，有时则成为两国关系颠簸震荡的由头。

过去百余年来，上述“国家内在属性的差异”“现代国际秩序的特征”“两国国家转型的需求”和“第三方因素的作用”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遗产”等诸因素相互叠加、深度纠缠，使百年间的中美关系明显划分成以下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

### （一）以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20 世纪初—1949 年）

中美关系的开端源自中国的清政府时期。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摆脱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才标志着中国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登上世界舞台，具有现代意义的中美关系正式展开。这一时间节点成为现代中美关系第一阶段的开端。

这一阶段国际秩序的突出特征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和国家垄断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帝国主义列强加

速海外扩张，各种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与政治矛盾、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不得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得以实现危机出清，将世界各国统统裹挟进去，中美两国也深深卷入其中；在此过程中，受到殖民压迫和战争蹂躏的后发国家的民族自决和主权意识日益觉醒，积极反抗外来侵略，谋求建立现代国家，中国是其中一员；资本活动的世界化、难以遏止的各种国际危机以及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客观上要求建立更为完善的国际秩序，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面。

这一阶段中美两国的转型需求或者说发展需求虽很不相同，也脱离不开列强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两国地位很不平等，但中美两国的诉求却有一定相容性：20世纪初期的美国已在经济实力上全球居首，政治上却未得到相应认可；国内资本急需寻找海外机会，但美国却在对外殖民方面远远落后。此时的美国必须在欧洲列强的纷争过程中寻找战略机遇，实现从国内发展向海外发展、从“后进强国”向“平等强国”的转型。这就推动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这一列强殖民“薄弱地带”寻找机会，通过倡导“门户开放”政策，以维护中国主权为名，排挤老牌列强在华特权，争取美国“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同时推动形成相应的国际政治安排，以便将美国的权益加以固化。而对于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国而言，此时则需要努力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转型成为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战略手段之一是借美国之力抑制外来国家，主要是日本的在华扩张。

日本是此阶段中美关系最大的“第三方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德、法等欧洲列强在华势力衰微，日本逐步获得独霸中国的实力优势和种种特权，遭致中美共同反对。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最主要对手，也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最紧迫威胁。美日各自扶持中国代理势力进行间接斗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开战，中日之间也爆发了反侵略与侵略的残酷战争。

在此条件下，中美两国便形成了各自诉求不同却总体上相向而行的关系，中国对美是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1918年美国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维护民族自决和弱小国家权利，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对中国山东的无理要求；1921年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与中国诉求形成呼应；继续倡导“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制衡日本在华特权尤其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奉行“不承认主义”（或称“史汀生主义”）；日本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美两国正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美国对中国抗战提供援助支持；二战后期，中美两国还联手推动创建联合国这一最重要的国际机制，对战后秩序作出安排，使现代国际秩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这一共同威胁消失，削弱了中美协同的基础。《望厦条约》等历史问题表明中美长期以来就是不平等的，美国亦是列强之一，只不过是相较于殖民资本主义而言的较新形态的资本主义而已。中美协同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美日妥协和对中国利益的伤害。二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选择继续对美依附的道路，显然与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自决的渴望背道而驰，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更加剧了其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美之间“一东一西”的政治矛盾骤然突出。中美关系必然从以协同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转向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第二阶段。

## （二）以正面对抗为主要特征的第二阶段（1949年—1979年）

中美对抗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开局，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此后很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彼此高度敌视。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始解冻，直至1979年两国建交，对抗关系才告结束。

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创建为有效管理大国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原则和框架，但美苏两大阵营在何种国家形态更为先进、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选择、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核武器的存在虽使双方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意识形态的敌对却难以避免。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失衡引发的各类矛盾和危机因两次世界大战得以出清，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为战后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普遍迎来一段经济较快发展的时期。美国经济经历“战后繁荣”，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这意味着，此时的美国和中国仅依靠自身潜力和各自阵营提供的发展空间就够了，在经济上对对方需求不大。相较之下，中美两国更在意的是各自的政治安全以及来自对方的意识形态威胁。对美国而言，为巩固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维系西方世界主导地位，塑造第三世界的道路选择，实现从“西方领导者”向“世界领导者”的转型，美国强力清除了国内亲共亲苏思潮，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自然是重要的政治对手。而此时的中国为保全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也极为重视自身政治

安全和意识形态工作，清除国内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回击任何来自美国的污蔑和威胁，甚至在能力范围内也向周边国家输出意识形态。中美两国在经历朝鲜战争的正面军事对抗后，又延续了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

苏联毫无疑问是贯穿中美关系第二阶段的最大甚至是主导性的“第三方因素”。但“苏联因素”在第二阶段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中国当初为实现主权独立而“一边倒”地站在苏联一边，苏联因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支持力量。但中国出于对国家主权的珍视，同样难以忍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转而对美国和苏联“两个拳头打人”。当苏联加大边境滋扰、对中国安全威胁日益加重时，中国开始尝试改善与美关系以构建对苏制衡；而此时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难以脱身，急需拉近与中国关系以重塑远东地区平衡。由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美关系因“一东一西”的属性差异而构成的矛盾开始下降，最终促成70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一南一北”的属性差异开始悄然发挥拉近中美关系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开始出现“滞涨”，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和社会乱象。这表明西方发达经济体所乐享的战后红利已经出尽，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发展空间趋于饱和，需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中国这边，“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遭遇挫折，由于技术和经验匮乏以及国际孤立处境，加之政策路线偏差，中国经济社会进步明显放缓，迫切需要改变发展模式，拓展外部合作。当然，在当时环境下，中美之间这种潜在的相互需要关系是双方都不便明言，甚至是没有明确意识到的。直到中国结束“文革”、果断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开启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中美之间这种“一南一北”的属性差异所蕴藏的巨大合作潜力，才一下子迸发出来。

### （三）以广泛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第三阶段（1979年—2018年）

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中美关系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第二阶段正式结束，以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第三阶段拉开大幕。

在此阶段，国际秩序的总特征是国际政治矛盾显著下降，而发展问题成为主线。中美建交后，随着中、美、苏三角趋于均衡和苏联内外困境加剧，苏联对美和对华威胁明显下降；特别是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

西矛盾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相比之下，全球发展和各国发展的问题更为突出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持续乏力，面临“发展困境”；中国、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从苏联阵营脱胎出来的转型国家，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和混乱局面，也同样面临“发展困境”。国际政治矛盾的降温，为全球化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都选择了将强化国际合作作为化解国内发展困境的核心手段。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以接触和融入为主的战略，将中国作为大幅推进产业转移的理想目标，支持中国加入 WTO 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国为着手解决发展问题，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姓社姓资不争论”的实事求是态度，大胆尝试治理体制变革，对学习西方持高度开放心态，努力从美国获取本国发展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经验和市场。正因为中美两国在化解发展困境上互有所需，两国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仍延续合作势头并获长足发展。

过去 40 年来的中美合作体现在诸多领域，影响也甚为深远。经济方面：中美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互补性合作，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入世”使世界经济体系更趋平衡，全球经济增长获得更强动力，全球通胀得到有效平抑，两国在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方面的政策协调，更是世界经济稳定之锚，一时间甚至产生“两国集团”的幻象。政治方面：两国元首会晤的领航作用持续强化，各层级对话与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从“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再到涵盖经济、外交、安全和人文四大领域的对话机制，两国政策协调得到机制化保障，确保了合作关系的稳定性。社会领域：地方交往和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支柱。尤其是，两国还在共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反恐、防扩散和应对金融危机等工作，中国愿意为维护国际秩序而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大国合作氛围下，日本、俄罗斯等此前的“第三方因素”，与中美总体保持了良性互动；朝鲜、伊朗、苏丹、阿富汗等新的“第三方因素”，则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作为前阶段两国关系历史遗产的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分歧，也在双方重新磨合和战略默契之下得到有效管控。

当然，这一阶段的两国合作并非毫无阻力和暗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曾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波折；1995 年李登辉访美，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以及“炸馆”“撞机”等事件，严重干扰中美合作。尤其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合作障碍明显增多。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重大缺陷和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层失衡，在各国引发广泛的政治危机和社

会危机；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尚能协力应对，但当各国处境分化后，国际合作明显失去动力，主要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受此影响，中美合作逐步失去势头。同时，中美两国均在全球化合作中积累了不少问题。美国的产业外包政策以及对金融资本的放松管制加剧了实体经济萎缩和“金融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引发 99% 与 1% 的高度对立，政治极化随之加剧。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经济失衡、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局部已具备发达特征并努力实现产业升级，两国“一南一北”的互补关系减弱、同质竞争增强，导致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华经济、科技的打压。中美关系中的东西差异也并未完全消失；中国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则为改革开放划定底线。美国长期对华实施“民主化战略”并最终希望落空，中国模式感召力日益增强，使美国不得不加强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国经济实力“坐二望一”，还显著改变了中美关系“一前一后”的方位特征，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继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通过各类双边、多边协定重塑国际政经体系，对中国加紧打压。

凡此种种显示，过去 40 年来以合作为主要特征的中美关系难以维系。由于国际秩序失衡加剧、两国内部挑战日积月累，两国合作的基础渐遭销蚀，国际秩序转型和中美各自转型箭在弦上，中美关系再次来到非变不可的关口。特朗普上任后，美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大国战略的重点从俄罗斯转向中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从合作转向竞争。2018 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美国国内在对华认知方面也呈现府会合流、两党合流、政商合流特征。这表明，中美关系脱离当前轨道而进入新阶段，具有必然性。

## 二、正在展开的中美战略博弈

如前所言，过去百余年来的中美关系乃是“国际秩序的阶段性特征”“中美两国的转型需求”“两国内在属性”以及“第三方因素”和“两国关系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 20 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发展失衡带来的世界危机，中美两国为实现各自的主权独立和国家跃升目标，“一前一后”的内在属性成为双方在一战之后和二战期间协同应对日本侵华的客观基础——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面对冷战期间的国家道路和国际秩序之争，中美为维护各自国家安全

和政治合法性，“一东一西”的属性差异使双方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爆发激烈对抗，“苏联因素”成为加剧和缓解中美对抗关系的关键变量——这是中美关系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三阶段，苏联日趋衰败并最终解体，国际政治矛盾程度下降，各国发展需求上升，中美“一南一北”的经济属性差异成为推动两国合作的决定性力量。两国为应对国内发展困境致力于深化双边合作，并携手维护有利于大国合作的国际秩序。如今，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合作的基础已然改变，中美关系再次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分析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应基于以下几个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

一是全球治理将长期深陷困境，国际秩序转型之争可能愈演愈烈。当前全球治理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客体（有待治理的议题）的“超国别性”与治理主体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大生产全面铺开，但全球治理体制仍主要立足于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机构机制，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并带有明显的食利性、等级化和排他倾向，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因利益差别而成效不彰，使各种经济性的（如金融危机）、安全性的（如恐怖主义）、社会性的（如贫富分化）、生态性的（如气候变暖）全球性难题日益累积。这种相对落后的秩序安排又反过来拖累了世界经济发展，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失衡和全球长期停滞的风险，身处其中的主权国家也因此成为受害者。面对这种状况，各国本应合力推进“更有管理的全球化”，强化国际协调以增进全球治理的效力、覆盖面和权威性；但由于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困难制约了其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之各国处境分化、目标各异，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点、方式和进度方面主张参差不齐，很难形成一致认可的权益分配安排和新型治理架构。这种局面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世界经济体系的失衡不可持续，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纠正——这决定了国际秩序转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围绕国际秩序转型的竞争不可避免。既然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全面好转，对市场的争夺难免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方面。各国可能会一方面加强保护本国市场、要求他国开放市场、拼命抢占国际发展空间并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甚至动用排他性措施“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上尽量切下较大的一块”；另一方面，在培育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例如人工智能、自动制造、新型通信技术与生物技术

等——方面展开白热化竞争。既然国际秩序的转型注定发生，各国会更加积极进取，努力在变局中挖掘机遇；转型到底体现谁的意志、维护谁的利益、按照谁提出的议程加以推进，成为大国竞争的另一焦点。更为深层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无论是对国际秩序转型的愿景设计，还是具体的规则倡议，背后都有一套哲学和价值观支撑，因而国际秩序转型必然触发冷战结束以来“尘封已久”的国际意识形态纷争。

二是中美同时启动新一轮转型，内部路线转换必然波及对外关系。为消化本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累积的内部问题、维护战略自主性并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美都将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更加广泛的政治共识、更加健康的社会结构和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新一轮国家转型的目标，从而力争校准本国在外部世界的关系，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更好维护本国长远利益。与过去几十年两国都乐于奉行“国际主义”原则不同，两国此轮转型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国家主义”特征，对经济自主、政治安全以及社会稳定予以更高关注。

在美国，“美国优先”口号虽因带有民粹色彩而遭致广泛批评，实则折射出十分广泛的民意倾向，反映出民众对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走得过远的深层焦虑。美国要实现新一轮转型，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维持科技优势、做大“美国制造”，从而维持高额利润、拉动本土就业。这种转变使美国对双边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科技政策以及所谓中国央企“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抱怨迅速增加；美国对自身经济安全、尤其是产业链安全的担忧，使美国对中国输美科技设备和对美科技投资更加警惕和抵制；以往运行顺畅的中美人文交流与科研合作，也被怀疑是“干涉美国内政”和“非法窃密”。在美国决策圈和战略界，长期以来奉行的通过推动中美合作而扩大共同利益的政策取向面临更大压力，通过对华竞争以更好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做法获得更大势头。美国在国家转型中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斗争，可能随时波及中国，使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时呈现出较大的波折反复和矛盾性。

在以往力推改革开放、聚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在此轮转型中将建设更加成熟完备和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国家形态作为重点。为此，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强化党的权威，为反腐（政治）、转型（经济）、脱贫（社会）、治污（生态）、正心（文化）、拓展（对外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设立相应机构机制，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重要战略事项，力争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及各领

域事务。这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加重，并感受到切实冲击。随中国资金和技术逐步充裕及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中国开始寻求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更注重自主创新和产业安全，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企业在华的超国民待遇和高额垄断利润越发难以维系；中国依法加强社会管理，一些在华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亦抱怨行动自由大不如前。着眼未来，中国在过去 40 年基础上开启新的改革开放，更明确宣称“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为国家形态演进设定前提，更加重了美国的不适。

过去 40 年里，两国均看重双边合作关系和两国共同利益，对对方总体上持接受态度；着眼未来，在各自国家转型和路线转换背景下，两国将更多强调本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互之间容忍度日渐下降，对对方在本国内的行动施以更多约束。

三是第三方因素更加多元复杂，使中美形成遍布全球的利益纠葛。过去百余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仅限于日本、苏联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而在新阶段，由于美国固有的全球大国地位以及中国快速拓展的全球合作网络，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几乎涵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由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长期持续以及美俄关系的微妙性质，“俄罗斯因素”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巨大。“五眼联盟”及欧洲等美国传统盟友在美国地位松动的背景下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是观察中美关系的重要指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如何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亦是美国高度关注的议题。非洲、拉美、南太平洋、东南欧等地区各国作为中美关系的“中间地带”，其内部政治生态和对外政策走向将时刻牵动中美两国的神经。此前的朝鲜、伊朗、阿富汗等传统第三方因素，也还在阶段性地牵扯两国的精力。

作为中美关系“第三方因素”的诸多国家，其内部状况千差万别，但大体上都面临着与中美两国类似的转型挑战；他们与中美两国的传统联系各不相同，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但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并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将中美关系引向对己有利的轨道。他们之中，有的可能希望中美维系合作以保全现有国际和平稳定，有的可能试图与中国或美国发展更紧密关系以获取更多实利或让大国为其遮风挡雨（获得安全保护），有的可能为避免“选边站队”压力而刻意游走于中美之间，有的可能因为对中美两国的一方充满恐惧而向另一方积极贴靠，有的则可能为实现自身战略目的而有意识地刺激中美做出某种反应并造成“尾巴摇狗”局面，甚至不乏企图从中美紧张关系中不当得利的居心叵